

理论特稿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中国话语

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话语的建立,能够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并在全球生态治理上积极掌握话语权,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

■胡良琼

中共中央、国务院前不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称《意见》),这是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后,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部署,不仅有助于全体国人认清和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而且还构建了系统、明晰的生态文明中国话语体系。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要在国内社会中肩负起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重任,还应在国际社会上充当推动发展、合作协调的大国角色。《意见》的提出,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明晰我国生态治理话语具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话语的战略意义

首先,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话语能有效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构建生态文明中国话语的直接要求,就是在继续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好地把握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三者间的关系,变革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逐步走上依靠科技、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依靠管理创新的集约型发展道路,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实力。同时,生态治理还须要全球共同承担责任,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话语的建立,能够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并在全球生态治理上积极掌握话语权,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

其次,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话语更好地体现了党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执政理念。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是价值创造和价值享受的主体。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话语,就是用最简单明晰的语言向广大人民群众

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并接受,使得个人的利益诉求和国家繁荣富强牢牢结合在一起,从而激励每一个中国人为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而努力奋斗。

再次,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话语是对“中国生态威胁论”的有力反击。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有些国家和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口爆炸等带来的巨大资源消耗,将使全球各种矿物能源、水、粮食等安全受到威胁,甚至把中国进行的对外援助与合作定义为谋求掠夺和扩张。这些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着我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甚至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话语,将更好地向世界传达,我国的发展并不依靠掠夺他国资源,而是建立在共同发展进步的基础上。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话语,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共同承担责任的大国形象。

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话语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当代中国话语处于不平等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弱势。受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局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势力,把控着国际话语的秩序和空间,主宰着国际社会的话语主体、内容以及传播方式,致使发展中国家一度处于被支配地位。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持续提升,但总体上说,我们仍未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导权。我国作为第三世界的最大国家,需要更好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观念和诉求,即便是在不平等的国际话语环境中,也要履行好与西方世界进行发展交流、合作援助的职责。

另一方面,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群众话语的关系紊乱,阻碍着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话语的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话语在学术表达时采

用的是政治话语,在政治表达时采用的是学术话语,在对群众的表达时却采用学术话语或政治话语。这样的话语表达选择不仅不利于生态文明话语的理解与传播。所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必须要学会面对不同的客体和受众,采取不同的话语表达,这样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话语更好地被社会所理解和传播。

此外,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困难,也阻碍着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话语的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情况并不乐观。多年的环保治污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切实得到扭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旧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发展方式未取得突破性转变,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仍对多重利益博弈的障碍。因此,从理论到实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在不断丰富生态文明理论的同时,更加努力地要把生态文明理论推进、落实到实践中去。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地位的路径

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地位,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头等重要的因素融入到中国梦之中,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改变消费模式。我们不仅要创新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方式,还要正确处理涉及环境资源的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摒弃落后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积极学习西方国家生态治理的相关经验,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拥有持续动力,提升国家经济实力,从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地位。

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地位,关键是凝练和清晰传递中国文化以及核心价值。作为世界上文化积累最深厚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资源,因此,我们今天所打造的中国话语,不应该割断与几千年语言文化的血脉联系,而应把那些沉淀在深层民族心理结构中的、至今仍活跃在中国人民生活和思想中的语言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并结合

时代特点进行创新和现代转换,在不排斥西方科学、民主话语的基础上,使之成为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的重要源流。同时,向世界传递清晰的“中国核心价值”,将充满生命力的“中国特色核心价值”逐渐融入到世界价值体系中,这有助于从意识形态高度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话语,既包容世界,又引领未来。

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地位,还应积极融入世界潮流,适应国际性的话语平台和对话机制。在争取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地位的同时,我们还需清醒认识到当今世界话语体系的格局现状,认识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西方主流国家对国际话语的霸权操控并非易事。因此,我们更应积极融入世界潮流,主动适应国际性的话语平台和对话机制,精心做好向世界传递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准备工作,用心讲好中国话语,耐心积攒累积效应,为不断增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地位而不懈努力。

(作者系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我国颁布首个生态文明建设文件,打造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话语。

CFP供图

论道说理

给哲学穿上“故事”的外衣

■冯燕芳

犹太教义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说的是真理赤露着身子的时候,不受人们的欢迎,而当寓言给她穿上了故事的外衣,她就被人们热情地迎进屋子里,邀请她一起在餐桌上吃饭、在火炉边取暖。这一故事,用来理解当下的哲学教学,颇有借鉴价值。

曾几何时,本该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哲学,成了不少人眼中的“玄远之学”,高深莫测、“难以接近”。或许,哲学也需要仿照“真理”穿上“故事”的外衣,走入普通人的生活。

哲学对于人们的生活不可或缺,它虽然不能解决我们的衣食住行,却能让我们正确地看待生活。谁的人生中没有得失、成败?没有困惑、迷失?谁的人生不需要面对名誉、地位、权势、金钱?如果我们拥有了看待生活的哲学智慧,凡事望得远一程,看得深一层,想得透一成,生活中的迷雾会渐渐消失,我们的内心就会豁然开朗,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变得美好。生活是多么需要哲学的“阳光”啊!

北京师范大学李向东老师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读懂西方智慧》和《一本书读懂中国智慧》,这两本书在讲哲学故事。笔者在讲授政治理论课时也经常引用其中的故事,大大改善了课堂效果。可见,故事的力量功不可没。

给哲学穿上“故事”的外衣,可以把那些晦涩的、抽象的东西转化为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趣味性的东西,让普通读者不费气力就能读懂哲学。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年龄大小、财富多寡、地位高低、经验多少,人们都不会抗拒听一个意味深长的哲学故事。穿上“故事”的外衣,哲学更易于被人接受,从而拉近与普通人的距离。此外,故事带有感情的内容,一个故事激起的共鸣或力量,比口若悬河的论证或者生硬的结论大得多。哲学通过故事是可以“走入”大众生活的。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部严肃的好的哲学著作可以完全用笑话来写成”。真正的哲学并不是干瘪的体系和教条,许多哲学问题总是以风趣幽默的故事或寓言的形式流传千古。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精神助产术”的对话中,经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比如用麦穗的故事说明爱情与婚姻,用甩手三百下的故事说明只有坚持才能成功;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是最善于讲故事的,他通过“庖丁解牛”说明只有通过反复实践,掌握了规律才能得心应手。哲学普及类读物《苏菲的世界》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位名叫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历程。其中,通过皇帝的新衣来讲述苏格拉底的智慧;通过戴眼镜等方式让人们理解康德的时间和空间“直观形式”;通过光着身体的男人来表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它的全球畅销与它借用故事的形式阐发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通过故事,哲学著作中的艰深玄妙才能褪色,哲学才能“走进”人们的生活。

给哲学穿上“故事”的外衣,其实是将哲学大众化、生活化、通俗化。因此,对“通俗会流于庸俗”的怀疑也从未间断过。其实,把正确的理论通俗化,只要理论不歪曲、不错误,没有失去哲理的深刻性,是决不会庸俗化的。艾思奇曾用岳飞的故事、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雷锋塔的倒塌等普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来说明哲学原理,创造了哲学大众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毛泽东曾称赞《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著作,黄楠森教授认为《大众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当然,哲学真正走入大众生活,需要一大批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进行艰苦的理论思维,除了研究如何将深刻的哲学思想转化为故事之外,还要进一步探索更多地哲学生活化的方式,以启发人们理解和掌握哲学思想。

在中华民族追梦圆梦的历史征程和历史任务面前,呼唤更多的哲学普及类读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

理论时讯

“以文化人与社会治理创新”理论研讨会召开——聚焦社会治理 推进以文化人

由教育部社科中心和清华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的“以文化人与社会治理创新”理论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围绕“如何发挥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健康社会肌体的形成与文化参与”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何庆研究员在研讨会上介绍了其多年研究形成的“健康社会管理文化”理论体系。健康社会管理文化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健康发展的思维活动、心理状态和意识的总和,由社会公德文化、社会风尚文化、社会管理技术文化和社会环境文化四大体系构成。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评议,认为该理论深入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切入社会治理、实现以文化人、发挥文化治国理政功能的现实路径和具体方法,回应了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现实需求,并就理论如何进一步优化、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学者们指出,以文化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文化介入社会治理,全面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育人功能。深入推进以文化人和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到导向明确;要坚持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开展研究,做到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要坚持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做到综合创新;要坚持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在科学理学的落地、落小、落实上多下功夫。

(刘好光)

学者观点

地方政府治理面临新挑战

■唐天伟 黄伟森

当前,经济“新常态”、简政放权及政府权力清单、社会治理及民生问题等,为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这些要求既带来了新机遇,又产生了新挑战。我国地方政府治理面临着治理对象、环境与困境的考验。

日益增强的网络性的挑战

首先,网络的开放性不仅改变了传统精英阶层对治理决策及话语权的垄断,而且调整了强势与弱势群体的力量格局,增加了社会弱势群体对地方治理的话语权。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网民达占全国网民总数的28.6%。这有利于农村网民通过网络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决策的过程,增强了传统弱势群体——农民对地方政府治理决策的影响力。网络的开放性还增强了公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使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更多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扭转其被动认可并接受地方政府治理安排的局面,促使其主动介入地方政府治理决策过程。

其次,网络的共享性打破了地方政府的信息垄断与封锁,将公众从传统媒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近年来快速膨胀的微博、微信等用户数量,为发布与传播网络民意提供了新平台。网络的不道德行为应能够被依法、违纪和道德行为快速地暴露于公众面前,营造一种舆论监督和治理氛围。这虽然有效地监督制

约政府及官员,但也暴露出地方政府治理的种种弊端。比如,地方政府治理的不公开、不透明、不沟通、不监督等现象,加深社会与公民对地方政府的误解,削弱了地方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有效性、针对性,动摇了地方政府的权威及公信力。

再次,网络传播的交互性改变了治理信息单向流动的方式,其他治理主体可以利用网络自上而下地将信息快速传递给地方政府,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充分了解其他治理主体的需要与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利于调整与优化其决策过程,但却加大了地方政府治理难度。

网络交互性还要求地方政府治理决策要根据多元治理主体的反馈而不断进行调控与矫正。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应对社会舆论信息传播、忽视其他治理主体等问题。

经济“新常态”的挑战

“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三期”,即经济增长速度从

经济“新常态”、依法治国,催生了公民对社会治理与生活质量的更高需求,人们越来越关注与自身息息相关的问题和民生问题。因此,如何有效回应公众合理的民生诉求,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高速转入中高速的换挡期、结构优化调整阵痛期、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消化期。适应“新常态”,客观要求地方政府治理树立新思维。比如,以前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地方政府治理过渡依赖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而现在这种情形却难以继。因此,适应新形势、树立新观念就构成地方政府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又如,经济结构调整要从过去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转变成既保增长又注重增长质量、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居民就业问题等多目标结构,这虽然使地方政府治理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要解决的问题却更加复杂、多样,难以取舍。如何实现多目标、协同多主体利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又一挑战。再如,经济“新常态”要求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求进一步向企业、社会简政放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证权力放而不乱。这也是地方政府治理不得不面对的一大考验。

此外,实行权力清单制也是挑战。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

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地方各级政府公布权力清单的时间表,如省级政府2015年年底前、市县两级政府2016年年底前要基本完成政府工作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权力清单的公布工作。这为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因为地方政府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面梳理和清理调整现有的行政职权、划定权力边界、减少官员的自由裁量、突出权力的法律依据,并非易事。

社会治理与民生问题的挑战

经济“新常态”、依法治国,催生了公民对社会治理与生活质量的更高需求,人们越来越关注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社会和民生问题。例如,高频曝光的腐败事件彰显了中央治理腐败的决心与力度,但也会使民众对当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产生误解,可能延缓现代多元治理主体达成共识。又如,治理不力、治理不合法导致的不止少社会冲突和民生纠纷,如屡禁不止的暴力拆迁事件、躲猫猫事件、天价香烟事件、艾滋病拆迁队事件,以及环境污染整治、社会应急管理、公共安全事件等,暴露出地方政府治理的种种弊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健全地方政府治理的社会监督模式、重塑地方政府治理的公信力、有效回应公众合理的民生诉求,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临的新挑战。

应对新挑战推进地方政府治理

首先,以网络治理回应网络挑战。结合网络的开放性、共享性、交

互性,广泛接受社会及舆论监督,以更加透明、开放、民主的方式开展治理决策,吸收多元主体参与地方政府治理,及时回应治理相关主体的关切。

其次,树立新常态,应对“新常态”。地方政府只有树立新常态,才能应对治理转型带来的阵痛,才能消化简政放权带来的不适应症。政府角色应从全面管理型过渡为有限治理型,充分发挥市场与社会在地方治理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社会能完成的任务应让渡给社会,地方政府治理主要任务应该是监管与服务。同时,遏制权力膨胀和滥用。

再次,依法行政,有效应对权力清单制度带来的挑战。地方政府治理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系统梳理和清理调整现有的行政职权,划定权力边界,实施权力清单制度,突出权力的法律依据;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充分保障市场、社会、公民等治理主体合法利益,提升政府治理的公信力与凝聚力。

最后,重视协同治理,科学应对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所带来的新挑战。地方政府应站在治理共同体立场上,对涉及本地全局性、长远性的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务进行管控与协调,而把涉及地域性、群体性、基层性的公共事务留给社会与市场治理,让公民通过社区、合作社、民间组织、社会企业等多种自治组织方式实施自我管理。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唐天伟系该校教授)